建道學刊 **54 (2020): 105-134**

傳承與發展——香港宣道會的奠基過程（1949-1953）[1]

何明章
宣道會美門堂
Mei Mun Alliance Church

一 引言

本文是筆者繼「第十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所發表〈中國內戰時期的宣道會（1945-1952）〉[2]（下文簡稱：〈內戰〉）的續篇；內容是闡述內戰後期宣道會撤出中國大陸以後，有十多名西教士不願離去選擇停留香港，繼而在當地開展福音工作的事蹟。

背景是在 1949 年上旬，宣道會有八十多名在中國大陸服侍的西教士，他們因內戰原故先後離開宣教工場，雲集香港等待總會進一步的安排。同年 7 月，總會決定關閉所有中國工場，並指令宣教人員轉往東南

[1] 本文曾在「第十一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中被公開宣讀，日期為：2019年6月15日。

[2] 參閱何明章：〈中國內戰時期的宣道會（1945-1952）〉，黃文江、張雲開、陳智衡編：《務要傳道——內戰時期的中國教會》（香港：建道神學院，2019），頁 255 ～ 279。另可參閱何明章：〈中國內戰時期的宣道會（1945-1952）〉，《建道學刊》第 50 期（2018 年 7 月），頁 31 ～ 62。

亞或美國候命。此刻，宣道會在中國的事工可算是曲終人散，在華有六十二年歷史的宣教工作似乎要劃上句號。然而，事情發展卻又峰迴路轉。1950 年初，該會尚有十多名西教士因不同理由沒有離去，依然逗留香港，並在這殖民地上開展福音工作。在短短三年時間，他們的努力滿有成果，後來獲美國總會認同並設立了「中國－香港教區」。如此，宣道會在華宣教的工作得以延續，且展開嶄新一頁。

本文正是闡述這十多名西教士在香港的思索與活動——時間由 1949 年他們從內地撤退轉到香港起，至 1953 年宣道會在當地正式設立宣教區止。換句話說，本文是記述「香港宣道會」[3] 的奠基過程。筆者寫作目的，除整理和記錄這段珍貴的歷史外，亦嘗試在過程中發掘這些西教士是如何在風雨飄搖和資源匱乏的情況下，能夠於短短數年在當地建立教會，並且開展各項事工以回應和服侍包括在內地、香港、台灣和東南亞各地華人的需要。迄今為止，有關研究個案是鮮有的，我們只隱約模糊曉得一些新教宗派在撤離中國大陸後轉到香港發展的一些片段。就宣道會方面，相關研究也十分有限，現時只有梁家麟的《福音與麵包——基督教在五十年代的調景嶺》[4] 及其姊妹文章〈五十年代宣道會在調景嶺的工作〉[5]；上述著作只探討宣道會在調景嶺的工作。而梁氏另一著作《建道神學院百年史》[6]，則簡單記錄了當年建道聖經學院的資料。至於其他事情，如：西教士在香港的思量、宣道書局在當地的發展、在難民及新移

---

[3] 「香港宣道會」一詞是指1949年後宣道會在香港的事工及組織，包括：在1950年成立的「全中國委員會」；1953年建立的「宣道會中國－香港宣教區」；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成立至今的「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及轄下堂會與機構。讀者請注意，這名詞不包括「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該組織雖在1940年由宣道會西教士創立，其名稱雖有「宣道會」三個字，但從未隸屬或加入宣道會；請參閱何明章：〈兩個宣道會的故事：「中華宣道會」與「香港宣道會」〉，《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通訊》第66期（2018年1月），頁17～27。

[4] 梁家麟：《福音與麵包——基督教在五十年代的調景嶺》（香港：建道神學院，2002）。

[5] 梁家麟：〈五十年代宣道會在調景嶺的工作〉，《香港社會與文化史論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2002），頁 131 ～ 151。

[6] 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

民聚居地建立教會……等等，現只有散亂和零碎的紀錄。因此，本文透過宣道會檔案及個別人士的傳記，嘗試發掘和整理一較完整的歷史個案，供大眾參詳。

二 留在香港的理由及人員名單

1949 年是中國教會一個重大轉折點。隨着中共掌政，西教士已不獲新政府歡迎；他們別無選擇離開所屬教區，與大陸信徒分離。從此，中國內地教會要走自己的道路；無論教會規模大或小、信徒生命成熟與否，皆要在經濟、治理及福音傳承上擔起自己的責任。

當年，有大量西教士和家眷從各省各市南下轉抵香港；他們雲集在只有一千多平方公里面積的英國殖民地上，作短暫停留以觀察局勢發展才決定去向。宣道會西教士也不例外，早於 6 月以前，總會看見國民政府的崩潰勢態，已吩咐所有西教士必須撤退並轉至香港暫避。在當地，他們大多停留在九龍塘一幢專為該會西教士子女而設的「宣道會兒童宿舍」（Alliance Children Hostel）；[7] 除與自己的孩子重聚外，亦等候由美國專程前來香港的國外部祕書長施納德牧師（Rev. A. C. Snead），共同商討當前對策。

如〈內戰〉一文所述，施納德牧師在 1949 年 6 月 1 日飛抵香港，逗留至 7 月 28 日才離開。期間，施氏約見每一位西教士，徵詢他們未來的工作意願。後來，因局勢發展，總會決定關閉所有中國工場，差會和西教士必須在政權交替前撤出中國大陸。首先，初出道的西教士必須即時離開香港並前往別的工場報到。而有經驗的西教士，則獲調派至東南亞華人社區工作，又或返回美國。

---

[7] Rev. A. G. Kowles, "By Flood and By Field," *The Alliance Weekly* 80, no.40 (1 Oct., 1949):632.「宣道兒童宿舍」的事情，可參閱何明章：〈兩個宣道會的故事：「中華宣道會」與「香港宣道會」〉。

施牧師在離開前，曾叮囑川黔教區主席兼宣道書局負責人包忠傑牧師（Rev. Paul H. Bartel）及宣道會兒童宿舍負責人貝光道牧師（Rev. John Bechtel）留守香港至最後一刻；他們兩人必須確保其他同袍安全離去後，才可返回美國或轉到其他地方。[8] 施氏有如此安排，是因為當前緊張的局勢。當年 4 月，長江下游發生了「紫石英號事件」（Amethyst Incident），[9] 此事造成中共與英國關係異常緊張，香港政府和市民也顯得人心惶惶。英國政府為穩住局面，在 1949 年夏天開始在香港增派駐軍。同年 9 月，英軍在香港的兵力已達至四個軍旅。他們在羅湖邊境部署了兩個軍旅、一個坦克兵團和大量炮兵；另有一旅則駐紮在九龍半島和新界各地，準備隨時向前線增援；而另一旅則協助當地警察維持市內治安。同年 10 月 17 日，解放軍推進至深圳邊境，雖然軍隊沒有繼續前行，但對身處香港的人士來說，事情已到了千鈞一髮的境地。

隨着局勢發展，當時海外差會持兩種不同觀點。有一派認為：在短時間內，中共將順勢收回香港；因此建議差會人員和資源盡速撤離，避免再次蒙受不必要損失（很多差會在大陸已損失不菲）。另一派卻認為：中共是無意急於收回香港，因新政府仍要鞏固政權，不會挑起像英國那麼強大的國家成為自己的敵人。況且，這殖民地是中國對外窗口，有助重建飽受戰爭蹂躪的經濟，對新中國的建設有莫大裨益。所以，該派人士建議差會可將內地撤出的資源留在香港發展。至於宣道會方面，當時總會抱持第一派觀點。最初，施納德牧師打算安排深諳粵語的華南區西教士傅證道牧師夫婦（Rev. & Mrs. C. C. Fowler）留在香港，開展福音工作；[10] 後來卻因美國總會對香港局勢不表樂觀、認為中共政府大有可能收回殖民地而作出否決，並且召喚傅牧師夫婦返回美國。[11] 不過，該會

---

[8] 包忠傑著，何頌賢譯：《包忠傑自傳》（香港：宣道，2006），頁161。

[9] 「紫石英號事件」在 1949 年 4 月 20、21 日發生，共軍在長江下游炮擊英國軍艦「紫石英號」，事件導致雙方多人死亡，包括該艦艦長；「紫石英號」最後逃脫並駛至香港。

[10] A. C. Snead, "China Situation and Transfer of Missionaries."

[11] A. C. Snead, "Letter to the Chairmen of the China Fields and Mr. Bechtel" (6 Sept., 1949); 傅證道牧師（Rev. Christian C. Fowler）的個人扎記。

有部分西教士不認同總會的觀點；他們深信中共不打算收回香港，並且認為與其將人員調往東南亞只有數十萬華人的社區，倒不如差派他們在有百多萬華人的香港發展。[12] 其後，因總會遲遲沒有表態，大部分西教士再沒耐性如此等候而離去。[13] 不過，仍有十數名西教士因不同理由堅持留在香港；而總會亦無可奈何接納他們的抉擇。

如〈內戰〉所述，在 1950 年初，仍然留在香港的人員名單如下：包忠傑夫婦——包牧師受總會所託，留守香港善後及負責宣道書局出版的工作；貝光道夫婦——貝牧師也是受總會所託留守香港善後至最後一刻；餘雅小姐（Miss Edith Alexander）——華中教區西教士，在香港協助包牧師處理宣道書局的事務；丁惠民牧師（Rev. August F. Desterhaft）——華南區差會主席，曾極力要求總會保留西教士在香港發展，但不得要領，他本人則繼續留在香港支援廣西教會和信徒；劉福羣夫婦（Rev. & Mrs. William C. Newbern）——華南區西教士，劉牧師在撤出大陸前是梧州建道聖經學院院長，原初總會是調派他前往越南西貢服侍當地華人，而劉夫人則在當地為宣道書局主編全新刊物《少年良友》。不過，劉牧師不情願到越南工作；他仍然掛念梧州聖經學院的事情，寧願在香港等待機會重返學院。[14] 還有高麗雲姑娘（Miss Charlotte Galvin）——華南區西教士，在香港協助包牧師及處理宣道書局的事務；海映光夫婦（Rev. & Mrs. Carter D. Holton）——海牧師是華西區差會主席，冀望在香港支援華西教會及信徒。除〈內戰〉提及上述十一人外，後來筆者發現另有三名宣道會西教士留在香港，他們分別為：歐粹珍教士（Miss Margaret C. Oppelt）——她是華南及華中區西教士；Miss Betty Johns （中譯名不詳）——華南區西教士，在宣道會兒童宿舍擔任護士；Miss Betty Arnold（中譯名不詳）——華南區西教士，在香港處理差會事

[12] A. F. Desterhaft, "Letter to Dr. A. C. Snead" (15 Sept., 1949).

[13] A. F. Desterhaft, "Letter to Dr. A. C. Snead" (22 Nov., 1949).

[14] 參閱：A. F. Desterhaft, "Letter to Dr. A. C. Snead" (17 Nov., 1949); A. F. Desterhaft, "Letter to Dr. A. C. Snead" (22 Nov., 1949); A. F. Desterhaft, "Letter to Dr. A. C. Snead" (6 Dec., 1949).

務。如此，當年宣道會共有十四名西教士留在香港；[15] 他們在有意無意的情況下，成為香港宣道會的奠基者。

三 設立臨時性差會組織：「全中國委員會」

如上所述，在 1949 年 7 月施納德牧師離開香港前，曾吩咐包忠傑牧師和貝光道牧師必須留守當地至最後一刻，並建議在香港設立「全中國辦公室」（All China Office）以處理中國四個教區的善後工作、協助所有在大陸或香港的西教士同袍轉往美國及東南亞地方。[16] 後來，丁惠民牧師、劉福羣夫婦、歐粹珍教士等人不打算離去；他們希望在香港接觸和支援內地信徒，並等待機會重返教區。再者，當時宣道會有三名西教士在大陸仍未撤出。[17] 有見及此，總會吩咐成立「全中國委員會」（All China Committee），旨在安排留港西教士的工作、支援內地信徒、幫助在大陸的西教士安全撤離。[18]

全中國委員會在 1950 年 2 月 14 至 16 日假宣道會兒童宿舍舉行第一次會議，包忠傑牧師為主席。三天會議主要編配在香港十四名西教士的工作。首先，Miss Betty Arnold 獲指派為辦公室祕書，協助委員會處理日常事務。就支援內地教區方面，四區皆有一名專員來負責：川黔教區——由原教區主席包忠傑牧師跟進；華南教區——由原教區主席丁惠民牧師跟

---

[15] 參閱 "The General Council-Part II," *The Alliance Weekly* 85, no.21 (27 May, 1950):325-26. 國外部祕書長施納德（A. C. Snead）在會上報告：「原本在中國大陸服侍的西教士，有41人調派至東南亞工作，另有14人逗留香港，仍有3人在中國大陸。」（筆者按：其他西教士則前往東南亞以外地方或返回美國。）

[16] A. C. Snead, "Report of Deputation by Foreign Secretary：China Situation and Transfer of Missionaries," (28 May – 25 Aug., 1949); "The C&MA Foreign Department to the Chairmen of the China Fields and Mr. Bechtel," (6 Sept., 1949); "Recommendations approved by Board," (8-9 Sept., 1949).

[17] 這三人包括：在上海教會的 Rev. E. G. Murray、在武昌看守物業的 Rev. R. H. Sjoblom 及仍在廣西靖西工作的何恩民牧師（Rev. A. G. Kowles）；詳情可參〈內戰〉一文。

[18] Rev. A. C. Snead, "China and Communism and Alliance Missions," *The Alliance Weekly* 84, no.48 (26 Nov., 1949):758,764,766.

進；華中教區——由餘雅小姐跟進；華西教區——由原教區主席海映光牧師跟進。另外，包忠傑牧師繼續主持宣道書局；貝光道牧師獲委派管理香港殖民地事務；而劉福羣牧師則獲委任為梧州建道聖經學院的總監，在香港跟進學院的事情。[19]

初期，全中國委員會除主要透過各種方式支援內地教會和信徒（見〈內戰〉一文），亦與「中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聯合會」（Chinese 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簡稱：「學聯會」／IVCF）[20] 攜手推動學生福音事工。事緣於 1949 年 12 月，趙君影牧師向丁惠民牧師提出邀請，建議在香港合作籌建「學聯會中心」，以推動大學生福音工作與復興運動。[21] 這事情獲總會接納，工作則交由全中國委員會辦理。1950 年 2 月，委員會派出劉福羣夫婦代表宣道會一方為聯合組織的董事，開展工作。[22] 不過數月以後，該事工卻不知何故而終止了。[23] 筆者相信，這與當年 6 月爆發韓戰（朝鮮戰爭）有莫大關係。根據全中國委員會紀錄，當時中、美交惡，令整個東亞局勢異常動盪，且有演變為大規模戰爭的可能。總會基於安全考慮，於 7 月開始減少在香港人員的數量，將部分女性同工和家眷撤離。兩位前華南區西教士 Miss Betty Johns 及 Miss Betty Arnold 亦因此離開香港。[24] 後來趙君影牧師也轉移陣地，在 1951 年前赴東南亞發展。

---

[19] "Minutes of the All China Committee, 14 Feb., 1950;" "Minutes of the All China Committee, 15 Feb., 1950;" "Minutes of the All China Committee, 16 Feb., 1950."

[20] 「中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聯合會」成立於 1945 年 7 月 12 日。當年 7 月，趙君影牧師在重慶南山的靈修學院舉辦「全國第一屆大學生夏令會」，吸引了 41 間大學團契、共 600 多名人士參加。會中多人得着復興，於是在令會結束前成立了學聯會，趙牧師則被推舉為總幹事。

[21] A. F. Desterhaft, "Letter to Dr. A. C. Snead" (6 Dec., 1949).

[22] "Minutes of the All China Committee, 15 Feb., 1950."

[23] "Minutes of the All China Committee, 2 Aug., 1950."

[24] "Minutes of the All China Committee, 13 July, 1950;" "Minutes of the All China Committee, 13 July, 1950;" "Minutes of the All China Committee, 27 Dec., 1950."

隨着韓戰爆發，大陸政府大力收緊對外政策，使西教士再難向內地教會作出支援。原本打算在香港等候機會重返內地的西教士，希望已完全破滅。如此，在 1950 年 8 月，原華西教區主席海映光牧師向全中國委員會請辭，夫婦二人懷着對內地信徒不捨的心情離去。[25] 而原華南教區主席丁惠民牧師亦在 1951 年 1 月提出請辭，如此結束他三十多年在中國的服侍，於 3 月返回美國。[26]

韓戰爆發，全中國委員會的工作焦點由原初致力支援內地教會和信徒，開始慢慢轉移在香港發展福音事工；這轉變是由幾個外在因素所致的。首先，西教士與內地教會接觸日漸困難；至 1951 年初，內地信徒根本不能與外界接觸，否則會被視作外國間諜。而隨着中共進一步加強對教會的管制，內地基督教出版社及神學院有被取締或關閉的可能。有鑑於此，全中國委員會決定在香港設立宣道書局、開辦建道聖經學院分校，以延續在華出版及神職人員培訓的使命。另一方面，當時有大批政治難民由內地湧入香港，數量之多，使這個小小殖民地變成難民集中營。宣道會西教士看見這些孤苦無助的難民，便向他們伸出關愛之手；後來則演變成在難民營和新移民地區傳揚福音、建立教會、開辦聖經學院等工作。

自這時候起，至 1953 年宣道會在香港設立教區止，全中國委員會漸漸把眼光轉移到香港及東南亞的福音發展上。就相關事情，如：出版工作、在難民營服侍、開辦聖經學院、服侍新移民、在台灣建立教會等，將於下文作個別陳述。

---

[25] "Minutes of the All China Committee, 2 Aug., 1950."

[26] "Minutes of the All China Committee, 25 Jan., 1950;" A. C. Snead, "Rev. A. F. Desterhaft," *The Alliance Weekly* 87, no.5 (30 Jan., 1952):76.

四 延續出版工作：在香港設立「宣道書局」

根據《包忠傑自傳》，在中共尚未南渡長江之先，宣道書局[27]的出版工作已由上海轉到香港了。大概在 1949 年 2 月，王峙先生從家鄉馬來西亞檳城來到香港，開始聯絡當地印刷商出版《聖經報》。[28] 初期，宣道書局租用崇真會一間在九龍的斗室，充當貨倉儲存書刊。而王峙先生和胡恩德先生則棲於喜樂（福音）堂，並在那裏進行《聖經報》的編輯工作。[29] 後來，巴色會讓出一個房間供他們作辦公室使用。同年 4 月，國、共在北平的和談破裂，中共軍隊渡江攻打南京，上海局勢岌岌可危。有見及此，負責上海宣道書局的馬三姑教士（Miss Ethel K. Marsh）帶同打字機、計算機及郵寄資料等轉往香港，在極度困難的情形下繼續工作。[30]

同年 6 月，總會國外部祕書長施納德牧師來華，在香港與西教士商討當前對策（見上文）。期間，施氏與包忠傑牧師討論宣道書局的未來。他們兩人皆認為，文字工作是宣道會在華宣教至關重要的事工，因此要竭盡全力維持書局運作。特別在當前局勢，西教士已不大可能留在大陸裏服侍；然而，《聖經報》及其他書刊卻能運往內地，廣大信眾仍可透過閱讀以建立信仰生命。[31] 有鑑於此，他們計劃將書局和《聖經報》出

---

[27] 宣道書局，即現今的「宣道出版社」，1911年由宣道會華南教區西教士翟輔民牧師（Rev. Robert A. Jaffray）在廣西梧州創立。1932年，宣道書局遷往上海。1949年宣道會撤出大陸之前，宣道書局除在上海與武昌設有辦事處及門市外，在重慶、柳州及廣州均有辦事處及代理商。

[28] 《聖經報》是在 1913 年創刊，是宣道書局一份重要及標誌性刊物；創辦人翟輔民牧師決心出版一份純粹解釋《聖經》真理的報刊，所以就索性將之定名為《聖經報》。解放前，《聖經報》風行內地數十載，對中國基督徒有莫大裨益。當年，王峙先生是《聖經報》的華人編輯。

[29] 喜樂堂位於深水埗大埔道 33 號 2 樓，當時王峙先生在喜樂堂之走廊作為他辦公的地方。

[30] 包忠傑：《包忠傑自傳》，頁 159；〈宣道書局簡史〉，《基督教週報》，1966 年 6 月 19 日，頁 2。

[31] A. C. Snead, "Report of Deputation by Foreign Secretary May 28- August 25, 1949 - China Situation and Transfer of Missionaries" (1949).

版遷到新加坡；[32] 而劉福羣夫婦轉往越南工作後，將安排他們協助書局編輯《聖經報》的青少年版（即：《少年良友》），並在當地華僑中推廣文字事工。基於以上安排，馬三姑教士與迪爾小姐（Miss Dear）前赴新加坡開設辦事處。然而，劉福羣夫婦沒有按照吩咐前往越南，他們選擇留在香港（見上文）。後來，身在香港的劉牧師協助書局印製《宣道詩》（*The Evangel Hymnal*）；而劉夫人則按計劃主編《少年良友》，該刊物在 1950 年 7 月正式面世。至於書局負責人包忠傑牧師，因受總會所託留守香港至最後時刻，致使他在 1951 年末仍停留當地；餘雅小姐一直協助他處理各項事務。[33]

解放初期，《聖經報》在香港印刷出版，部分由香港辦事處直接送到鄰近華南、台灣及菲律賓教會和讀者手中，其餘大部分則以船運轉到新加坡和上海兩地辦事處。在新加坡，馬三姑教士負責分發報刊至馬來西亞、印尼及中南半島的華僑讀者。上海方面，當地辦事處仍然運作，華人同工許小姐（Miss Emily Hsu）收到從香港運來的包裹後，會以平郵方式轉發至各省市讀者手中。後來，包牧師欣喜地發現，《聖經報》及《少年良友》可從香港郵局直接寄往內地城市而不被審查。[34] 如此，在沒有西教士的情況下，內地信徒可閱讀《聖經報》增長知識，心靈也得着安慰。至 1951 年 3 月，《聖經報》及《少年良友》的發行量分別高達 10,000 及 5,000 份，當中大部分是發往內地。[35] 不過，上述運作只維持了兩年時間；

---

[32] "One For Another," *The Alliance Weekly* 84, no.30 (23 July,1949):475; "One For Another," *The Alliance Weekly* 84, no.35 (27 Aug.,1949):555.

[33] 包忠傑：《包忠傑自傳》，頁 161、164；A. C. Snead, "To the Chairmen of the China Fields and Mr. Bechtel" (6 Sept., 1949).

[34] Paul H. Bartel, "A Vital Ministry in an Important Interlude," *The Alliance Weekly* 84, no.46 (12 Nov.,1949):731; Paul H. Bartel, "The Alliance Press Carries On," *The China Tidings of the 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 (January 1951): 14-16; *Missionary Atlas: A Manual of The Foreign Work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1950), 97; "Minutes of the All China Committee, 5 May, 1950."

[35] Paul H. Bartel, "The Chinese Bible Magazine Continues Its Ministry," *The Alliance Weekly* 86, no.13 (31 March,1951):201.

隨着新政府不斷加強對外來書信的管制，基督教刊物進入內地是愈來愈困難。[36] 至1951年末，內地信徒甚至發電報至香港，懇求不要再寄《聖經報》及信件給他們，以免被懷疑是美國間諜。[37] 如此，宣道書局終止運送刊物進入大陸，在內地的一切事工亦告終結。

當內地工作面臨結束之際，宣道書局在香港和東南亞卻日益發展。1951 年，書局開始將出版書刊和福音單張分發到香港的中、小學校及公共圖書館，供學生和大眾免費索取。在東南亞方面，《聖經報》及《少年良友》則增加分發數量和地點。除此以外，宣道書局與「遠東廣播」合作，製作普通話廣播節目以推廣聖經閱讀；書局方面則另有教材免費分發廣大聽眾作補充材料。[38] 後來，廣播節目大獲好評，並發展為有系統的聖經函授課程。函授課程共二十單元，參加者在開學前會收到由書局寄來的課程指引，學員只需按時聆聽收音機廣播學習、課程完結通過筆試則獲發畢業證書。[39] 1953 年初，函授課程有 1,000 人報讀，學員分別來自香港、澳門、台灣、越南、緬甸、馬來西亞、菲律賓、日本、沙勞越、印尼及美國的華人。[40] 同年年尾，報讀人數超過 3,000。[41] 至 1954 年 10 月，因人力和資源有限，宣道書局把函授課程交由西差會經營；後來西差會將函授課程轉到長洲建道聖經學院內舉行，經費由西差會及聖經默想聯盟（The Bible Meditation League）共同承擔。[42]

---

[36] John Bechtel, "Christian Propaganda," *The Alliance Weekly* 86, no.38 (26 Sept.,1951): 602-603.

[37] Paul H. Bartel, "Good News from Hong Kong," *The Alliance Weekly* 86, no.45 (14 Nov.,1951):713.

[38] Paul H. Bartel, "Sowing Beside All Waters," *The Alliance Weekly* 86, no.26 (4 July,1951): 411-12.

[39] John Bechtel, "Chinese Bible Correspondence Course," *The Alliance Weekly* 87, no.8 (27 Feb.,1952):137-38.

[40] John Bechtel, "Postal Evangelism from Hong Kong," *The Alliance Weekly* 88, no.1 (7 Jan.,1953):9-10.

[41] "The China-Hong Kong Field 1953 – Chairman's Report."

[42]〈介紹本會聖經函授部〉，《宣道消息》第 2 期（1956 年 7 月 15 日），頁 11 ～ 12。

隨着宣道書局在香港和東南亞有長足發展，同時香港局勢亦有緩和現象，自 1952 年起，書局已視香港為建立總部的地方。[43] 他們首先在九龍城獅子石道找到一個樓下單位作為基址。後來因地方不敷使用，書局再遷往加連威老道；隨後又遷到漆咸道 51 號。[44] 人事方面，包忠傑牧師在 1951 年 12 月返回美國與家人團聚，餘雅小姐及高麗雲姑娘則繼續在香港處理日常業務。[45] 至 1953 年 3 月，白光照牧師（Rev. Roy. J. Birkey）[46] 到香港接替包牧師出任書局董事和負責人。[47] 從這時起，宣道書局不單服侍香港和東南亞各地華人，其抱負更是全世界所有中國人。[48] 多年來，宣道書局以文字方式、透過出版不同的基督教書籍及刊物造就了千千萬萬的華人信徒，其使命延續至今。

五 服侍調景嶺難民 [49]

（一）「宣道會調景嶺堂」的建立

1949 年至 1951 年間，包忠傑牧師除領導全中國委員會及宣道書局外，在另一邊廂，他則與貝光道牧師聯同「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

---

[43] Bechtel, "Chinese Bible Correspondence Course," 9-10.

[44] 〈宣道書局簡史〉，頁 2。

[45] "The Ministry of Prayer," *The Alliance Weekly* 87, no.4 (30 Jan.,1952):75.

[46] 白光照牧師是包忠傑牧師太太白愛蘭 (Ina Birkey) 的兄長。白牧師第一任太太去世後，在 1952 年娶餘雅小姐為妻子。

[47] "Minutes of the All China Committee, 12 March, 1953."

[48] Eva I. Newbern and Ruth E. Lindstrom, "Letter of Appeal to the Board of Managers, New York" (18 June, 1953).

[49] 宣道會在調景嶺難民營的工作，可參考梁家麟：〈五十年代宣道會在調景嶺的工作〉一文及何明章：〈宣道運動在香港：香港宣道會的發展歷史（1949 年 -1999 年）〉（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7）。

會」[50]（下稱：塘宣）在摩星嶺向難民宣講福音，繼而跟隨這些孤苦無助的難民進入調景嶺，在難民營內服務他們。

根據現有紀錄，宣道會最早投入難民工作，是包牧師的太太白愛蘭女士（Mrs. Ina Bartel）。1949 年 9 月，他們由大陸轉到香港以後，包師母隨即關心從內地湧入的難民。[51] 此刻，正是慈善組織「東華醫院」收容首批逃難到港的國民黨人，把他們送到西環一別亭棲息、供應他們膳食。其後，難民蜂擁而至，東華醫院與香港政府商議後，在 1950 年 3 月 28 日將 4,889 位難民安置在香港島西面的摩星嶺上。這些難民大部分只說國語，在香港言語不通；他們找不到工作，認為自己身陷絕境。在另一方面，當時由大陸撤退來到香港的西教士，正在停留等候差會指示，眼見大批難民湧至，處境淒涼；因此，他們與本地教會聯合起來，同心協力幫助難民度過難關。[52] 包忠傑夫婦也不例外，他們聯同趙君影師母和塘宣的婦女組織，一起在摩星嶺推動難民探訪和佈道工作。[53] 當時包牧師曾有感言：「以前我們想見這些官員，要經過一層層的傳報，現在他們都齊集在這裏，我可隨時見他們，又可向他們傳福音，多麼美好。」[54] 1950 年 5 月，包師母回美與孩子團聚，包牧師則繼續推動難民工作。

隨着難民數目愈來愈多，香港政府計劃將他們安置在更偏遠的調景嶺上，包牧師和貝光道牧師聽聞消息後，隨即前往當時的社會局[55] 申

---

[50]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在1940年由宣道會西教士貝光道牧師創立，可是該教會從未隸屬或加入宣道會；詳情可參閱何明章：〈兩個宣道會的故事：「中華宣道會」與「香港宣道會」〉。

[51] 包忠傑：《包忠傑自傳》，頁 164。

[52] 劉福羣著，李世勳、王珊合譯：《十架與冠冕》（香港：宣道書局，1979），頁 179。

[53] Rev. John Bechtel, "Graduation Day in a Refugee Bible School," *The Alliance Weekly* 86, no.15 (14 April,1951):233. 當時趙君影師母帶領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的婦女團契投入關心難民。

[54] 《包忠傑牧師紀念文集》，（香港：基道，2002），頁 85；該段文字是潘士端牧師與包忠傑牧師交往的紀錄。

[55] 即現今的「社會福利署」。

請在該地設立教會辦事處，並獲當局批准。[56] 從這時起，宣道會由原初的難民探訪工作，轉變為全方位的難民服侍。他們把握這千載難逢的機遇，在調景嶺展開一連串工作。多年後，劉福羣牧師憶述當時的景況：「我們頓時醒覺到，幾乎在一夜之間，香港便成為一個新的宣教工場。」[57] 然而，當時正值韓戰爆發，美國總會要求全中國委員會裁減香港人員的數目。由此可見，調景嶺事工的開展，對包、貝兩人是要面對何等巨大的挑戰。起初，全中國委員會委任海映光牧師專責統籌事工，另聘請華人牧者高玉銘牧師[58] 進駐難民營擔任佈道工作。兩個月後，海牧師請辭返回美國（見上文），統籌工作交由歐粹珍教士接任，貝光道牧師為監督。[59]

在難民未抵達調景嶺之先，他們已準備就緒——在營內挑選最好的位置，平整了大片土地後並興建一間木屋作基址，準備迎接難民的到來。1950 年 6 月 26 至 27 日，首批難民抵達調景嶺；海映光牧師、歐粹珍教士及高玉銘牧師隨即展開佈道工作。宣道會進入難民營比其他宗派都要早，又佔盡地利，所以每晚的佈道聚會都是座無虛席。[60] 每個星期日的露天崇拜，平均出席人士都超過八百之數。[61] 當時有些難民在精神上已瀕臨崩潰，而大多數人猶如生活在絕境之中；他們前來教會尋求協助，基督福音則安慰了他們沉鬱的心，每次聚會都有人願意跟隨基督。[62]

---

[56] 包忠傑：《包忠傑自傳》，頁166。

[57] 劉福羣：《十架與冠冕》，頁 180。

[58] 高玉銘牧師為華北人，曾在宣道會華中教區武昌宣道聖經學院教學，解放時南下香港。

[59] "Minutes of the All China Committee, 2 Aug., 1950."

[60] 范約翰：〈調景嶺福音工作之九：災禍頻仍〉，《基督教週報》，1972 年 4 月 16 日，頁 3。

[61] Rev. John Bechtel, "Hong Kong-Kowloon Region, Report for the Foreign Department, 1950."

[62] Margaret C. Oppelt, "Rennies Mills Chinese Refugee Camp," *The China Tidings of the 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 (January 1951):16-18.

一個月後，接受基督並願意加入教會的人數愈來愈多，高牧師需要開設洗禮班；首次報名已超過200人。

宣道會在調景嶺首次的洗禮是在 1950 年 8 月至 9 月間，確實日期有待查考。當日洗禮者共 105 人，在調景嶺一處僻靜的海難進行。[63] 與此同時，全中國委員會亦開始計劃興建一所可容納六百人的教堂，供信徒崇拜和培訓之用。[64] 其後，宣道會與「兒童基督教福利會」合作興建教堂，[65] 地點在宣道會的基址上。1950 年 11 月，「調景嶺堂」[66] 正式落成，[67] 高玉銘牧師為堂主任。[68] 在 1950 年至 1951 年間，該會在調景嶺共施行了五次洗禮，領洗者合計 992 人。如此，於短短年半內，宣道會在香港的會友數目由零迅速增至一千人；他們大多是從內地逃難香港的國民黨人，在調景嶺等待國民政府的接濟，希望不日轉到台灣生活。

（二） 開辦「宣道聖經學院」

1950 年 11 月，在調景嶺堂落成以後，堂會隨即開辦「短期聖經學校」培育信徒。課程為期三個月，逢星期三、五上課，學習時間由早上至下午。首次報名並通過入學考試共九十九人。課程方面分別有：聖經教義、教會歷史、舊約概覽、新約概覽、馬可福音、路加福音、約翰福音、聖靈工作等。[69] 人員編制有：貝光道牧師（校長）、高玉銘牧師（註冊兼

---

[63] 記錄第一次浸禮的資料：Rev. Paul H. Bartel, "A Happy Sequel to Tragedy," *The Alliance Weekly* 85, no.38 (23 Sept.,1950):601-602.

[64] "Minutes of the All China Committee, 21 Aug., 1950."

[65] 范約翰：〈調景嶺福音工作之九：災禍頻仍（續篇）〉，《基督教週報》，1972 年 4 月 23 日，頁 3。

[66] 當時堂會的名稱為：「中華基督教宣道會調景嶺福音堂」，見：《中華基督教宣道會調景嶺福音堂成立四週年暨宣道聖經學院第一屆畢業紀念特刊》（香港：香港調景嶺宣道會，1954），封面頁。

[67] Rev. John Bechtel, "A day of Joy at Junk Bay Refugee Camp," *The Alliance Weekly* 86, no.2 (13 Jan.,1951):25; "Minutes of the All China Committee, 21 Nov., 1950."

[68] 劉福羣：《十架與冠冕》，頁 179 ～ 180。

[69] 資料原文為英文，課程名稱由筆者翻譯。

教務主任），其他老師則分別有丁惠民牧師及貝光道師母；華人老師則有塘宣三名傳道人：丘育靈先生、朱建磯先生及彭惠華女士。第一屆共有六十六名畢業生，他們滿足學業要求並獲發結業證書。[70]

首屆課程完結後，學校隨即開辦第二屆課程，新一屆學生人數與首屆相若；課程於 1951 年 4 月初開始，在 6 月尾結束。[71] 短期聖經學校只辦了兩屆，[72] 原因是信徒中有不少是受過高深教育的知識分子，他們完成三個月培訓後，便請求教會開辦一個更為完備的課程。如此，短期聖經學校便演變成「宣道聖經學院」。[73]

1951 年秋，宣道聖經學院正式開辦，其宗旨是提供具一定教育程度的信徒能有機會作深入的聖經研習。[74] 因此，該校雖稱為聖經學院，本意卻不是培訓全職傳道人；這在日後造成西差會與畢業生之間的誤會。招生時，學院聲明不負責學生的食宿；修業期間，學生必須仰賴香港政府的救濟。然而，學生不用繳交學費，教授也不取薪酬；因此學院的經費甚少，這是全中國委員會在難民營開辦學院的主要考慮。學院課程為期三年，一年有兩個學期，採用建道聖經學院的教材。入學者必須擁有高中畢業或以上學歷；話雖如此，大部分申請者無法提供學歷證明，而校方是沒法得知他們的背景。首年，學生有五十九人。[75]

老師陣容方面，初期仍是短期聖經學校的老師。及至 1951 年尾，包牧師及貝牧師回鄉休假；原華南教區白德三牧師（Rev. Robert Patterson）

---

[70] Rev. John Bechtel, "A Short Term Bible School at Hong Kong," *The Alliance Weekly* 86, no.4 (27 Jan.,1951):57; Bechtel, "Graduation Day in a Refugee Bible School," 233.

[71] "Minutes of the All China Committee, 31 March, 1951."

[72] 海南：〈前言〉，《中華基督教宣道會調景嶺福音堂成立四週年暨宣道聖經學院第一屆畢業紀念特刊》，頁 1。

[73] 劉福羣：《十架與冠冕》，頁 180。

[74] "Minutes of the All China Committee, 13 Nov., 1951."

[75] 周正道：〈我信主和蒙召的經過〉，《中華基督教宣道會調景嶺福音堂成立四週年暨宣道聖經學院第一屆畢業紀念特刊》，頁 71；劉福羣：《十架與冠冕》，頁 180；Rev. John Bechtel, "Hong Kong Regional Report, 1951."

從加拿大來港，接替兩人在全中國委員會及調景嶺的工作。[76] 另外，西教士 Miss Geneva Sayre 及白光照牧師亦分別在 1951 年尾及 1953 年初加入教授行列。[77] 1952 年 7 月，貝光道牧師返回香港，重掌校長一職。[78] 華人老師方面，在 1951 年底，趙君影師母隨丈夫轉往南洋；丘育靈先生在 1952 年秋赴美深造。後來，塘宣開始淡出調景嶺工作，朱建磯先生及彭惠華女士亦退出教授行列。而接替他們的新力軍則有：在 1951 年從山東來港的王澤生牧師，[79] 他加入宣道會成為調景嶺堂牧者，同時承擔學院的教學工作。除王牧師外，另有在 1949 年從南京來港的王守寰牧師，他每周都到營中授課。[80] 而高玉銘牧師雖在 1954 年卸下調景嶺堂堂主任職務，但仍繼續為學院服務，擔任教務主任至 1955 年 6 月第二屆學生畢業。[81]

學院學生除在課堂學習聖經知識及應付期考外，還要在營內幫助堂會、在營外佈道服侍。營內，他們協助調景嶺堂舉辦青年團契、查經班、英文班、體育班等；也教導千餘名不同年齡的孩童，讓他們在教會學道成長。營外，他們自組佈道隊四出佈道，向說國語的新移民宣講福音。[82]

1952 年學院再度招生，這是學院最後一年收生，新學年開課時學生共七十人。[83] 而翌年不再收生的主因，是學院面對龐大財政壓力。後來，

---

[76] Rev. Paul H. Bartel, "China Chairman's Report 1951."

[77] "Minutes of the All China Committee, 4 Dec., 1951;" "Minutes of the All China Committee, 26 March, 1953."

[78] Clifford E. Harrod, "The Alliance Family," *The Alliance Weekly* 87, no.34 (20 Aug.,1952):545; "Minutes of the All China Committee, 9 Sept., 1952."

[79] 原名王德潤牧師，王牧師是青島中華基督教會同道堂創辦人。

[80] 王守寰：〈話說當年〉，《建堂卅週年紀念特刊（1952-1982）》（香港：基督教宣道會國語堂，1982），頁 4 ～ 7。

[81] 海南：《前言》，頁 1；Rev. John Bechtel, "Dragon Boat Day in Hong Kong," *The Alliance Weekly* 90, no.32 (10 Aug.,1955):9.

[82] 都乾初：〈宣道聖經學院學生聖工紀實〉，《中華基督教宣道會調景嶺福音堂成立四週年暨宣道聖經學院第一屆畢業紀念特刊》，頁 81~83。

[83] Rev. Robert Patterson, "The All China Committee Chairman's Report 1952;" Rev. John Bechtel, "Schools Start Fall Term," *The Alliance Weekly* 87, no.50 (10 Dec.,1952):798.

西差會將學院併入長洲建道聖經學院，並打算在第二屆學生畢業後結束學院。[84] 宣道聖經學院第一屆畢業生有 19 人（共 18 男 1 女），名單中包括日後廣為人知的宣道會華人牧者：都乾初、崔冠軍、時恩證及孫立爽（時恩證太太）。[85] 第二屆畢業生有 18 人（共 17 男 1 女），畢業禮在 1955 年 6 月 24 日舉行。[86] 兩屆畢業生合共 37 人，數字遠低於學生入學的人數；原因是有少數人在中途轉到建道學習外，[87] 絕大部分是因獲國民政府批發赴台簽證而輟學。這 37 人畢業後大多投身教會或福音機構服侍，有部分成為宣道會牧者並前往偏遠地區及徙置區佈道開荒，其堅毅意志贏得多方讚賞。他們建立的堂會，日後成為香港及台灣宣道會的重要部分。

六 延續培訓工作：在香港開辦「建道聖經學院」

除宣道聖經學院外，當年全中國委員會亦在香港開辦建道聖經學院；該學院是由劉福羣牧師一手建立的，其心路歷程與辯白[88] 記錄在《十架與冠冕》。[89] 宣道會撤出大陸後，總會原本安排劉牧師夫婦前往越南西貢服侍華人社羣，後來兩人沒有遵從指示。根據西差會紀錄，劉牧師原

---

[84] Bechtel, "Dragon Boat Day in Hong Kong," 9.

[85] 第一屆畢業生還有：譚書圃、鍾峻父、陳述儀、盧至方、汪紫峰、劉天義、王晉之、管淵若、候雯霖、李鴻志、陳澈、張凌霄、劉世武、周中文、張宗元。參《中華基督教宣道會調景嶺福音堂成立四週年暨宣道聖經學院第一屆畢業紀念特刊》之內容。

[86] Rev. John Bechtel, "Dragon Boat Day in Hong Kong," 9; 及參考以下資料相片的註腳內容：*The Alliance Weekly* 90, no.32 (10 Aug.,1955):16. 根據〈調景嶺堂消息一束〉，《宣道消息》創刊號 (1956 年 6 月 15 日)，頁 9 ～ 13，第二屆畢業生名字如下：李道崇、葉道基、黃勇、黃可羣、周正道、林秀庭、凌克非、張偉民、陳國賓、倪鴻勛、葛有仁、鄧鵬、邵（鄧）宜之、陳亨元、趙文雅、劉俊、張允宜、施滌凡及崔懷漢。

[87] 當中包括：魏道榮、王克章、曾式中、王力耘、伍希勇等人。

[88] 當年，劉牧師不聽從差會吩咐，堅持在香港開辦長洲建道聖經學院的事情，曾惹來不少非議；此書可說是他對事情的自辯和解說。

[89] 劉福羣著，李世勳、王珊合譯：《十架與冠冕》（香港：宣道書局，1979）。

打算在中共接管梧州以後，便與歐粹珍教士一起重返學院工作。[90] 後來因政治因素不能成行，劉牧師便選擇逗留香港，「盡量與梧州的聖經學院保持聯絡，並且在香港尋找事奉的機會。」[91] 如上文所述，在香港初期，劉牧師夫婦曾代表宣道會與「學聯會」開展學生福音工作；同時亦幫助宣道書局出版《宣道詩》及《少年良友》等刊物。不過，身在香港的劉牧師，心思仍惦念着梧州學院及其數十名神學生。

根據《十架與冠冕》，在 1949 年建道聖經學院慶祝五十週年之際，劉牧師已預料梧州學院將要面臨關門的命運。[92] 當年，西教士已盡數撤離，學院沒有足夠老師授課，因此安排高年班學生到各地堂會實習，以減輕華人教員的壓力。然而到了 1950 年初，華人同工李光華去世，另一位則請辭離開，人手更見緊張。[93] 如此，在 1950 年 6 月 29 日全中國委員會會議上，劉牧師建議學院在新學年（即 1950 年秋季），將三年級學生領來香港培訓。這事情經委員會熱烈討論，認為此舉牽涉一些重大問題，如：培訓學生的地方、教職人員招募等等。後來，委員會認為事情必須留待 7 月與華會舉行聯合會議時才進行定斷。[94]

如〈內戰〉一文所述，中國宣道會兩會聯合會議在 7 月 27 日至 8 月 2 日舉行，內地各區華人領袖前赴香港與西教士共同商討當前對策。會議中，鑒於梧州學院老師嚴重缺乏，大家同意在香港開設分校，將三年級學生轉到香港上課。[95] 劉福羣牧師得償所願，便隨即前往新界尋找

---

[90] A. F. Desterhaft, "Letter to Dr. A. C. Snead" (9 Nov., 1949); A. F. Desterhaft, "Letter to Dr. A. C. Snead" (17 Nov., 1949); A. F. Desterhaft, "Letter to Dr. A. C. Snead" (22 Nov., 1949).

[91] 劉福羣：《十架與冠冕》，頁 113。

[92] 劉福羣：《十架與冠冕》，頁 129。

[93] W. C. Newbern, "The Wuchow Bible Institute-1949; 1951," *The China Tidings of the 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 (Jan.,1951):10.

[94] "Minutes of the All China Committee, 29 June, 1950."

[95] "Minutes of the Joint Meeting of the All China Chinese and Missionary Committees, 27 July-2 Aug., 1950."

可建分校的地方。[96] 最後，全中國委員會撥出原翟輔民牧師（Rev. R. A. Jaffray）[97] 在長洲的別墅，給建道開辦香港分校。[98] 與此同時，劉牧師致函廣西三年級學生，促請他們前來香港。最後，有 10 男 10 女、合共 20 名學生由內地趕赴香港繼續學業。[99]

1950 年 10 月 16 日，長洲建道聖經學院在翟輔民紀念堂舉行開幕典禮。該校坐落長洲小島的山頂上，距離香港市中心約 10 公里。長洲建道第一學年共有 22 名學生，除 20 位從梧州前來的學員，還有兩名旁聽生。授課是在簡陋的翟輔民紀念堂進行，課程沿用梧州學院的，只是學生在師資缺乏的情形下上課。授課老師除有劉福羣夫婦、包忠傑牧師和貝光道牧師外，還邀請了一些資深華人牧者，如：趙君影牧師、趙世光牧師及周志禹牧師等前來兼教襄助。經過八個月培訓，20 名從梧州來港的學生正式畢業，他們是建道學院第 43 屆畢業生，也是建道在香港首屆畢業生；畢業禮在 1951 年 6 月 30 日假尖沙咀山林道浸信會舉行。[100]

建道在香港設立分校原是一項臨時性措施，目的只為幫助梧州聖經學院三年級學生完成學業，畢業後他們便要返回內地，因此學院是不打算招收新生。[101] 及至 1951 年初，梧州建道聖經學院在經濟和政治壓力下關門。如此，劉福羣牧師便籌劃新學年（1951 年秋季）在香港

---

[96] 伍希勇：〈三重恩〉，《宣道會上水堂——三十週年特刊》（香港：宣道會上水堂，1989），頁10～11。在1950年，九龍塘中華宣道會梅澤生先生曾陪伴劉牧師到新界各處物色院址。

[97] 翟輔民牧師是前中國宣道會華南教區主席兼梧州建道聖經學院院長，他在 1945 年 7 月於印尼日軍集中營逝世，其遺囑指明將他在長洲的私人別墅送贈宣道會。

[98] "Minutes of the All China Committee, 4 Sept., 1950."

[99] 劉福羣：《十架與冠冕》，頁 131。

[100] Newbern, "The Wuchow Bible Institute-1949; 1951," 10; 劉福羣：《十架與冠冕》，頁 132；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頁 169 ～ 172。

[101] W. C. Newbern, "Report to Conference: South China, 1951" (1952).

收生，以延續建道聖經學院五十多年的使命。然而，當時東亞局勢異常緊張，香港的情況也非常混亂，大多數人認為中共將於短期內收回香港。就美國總會方面，一向已不認同劉牧師的獨行獨斷，當聽聞他要在香港設立聖經學院更是震驚；他們告誡劉牧師，並詢問他是否清楚前面的道路。[102] 在沒有總會認同下，劉牧師唯一可仰賴是中國信徒的支持，他向世界各地的校友和宣道會會友發出呼籲，希望他們大力捐助建設長洲學院。全新學年終在 1951 年 9 月 15 日開課，有 10 男 11 女報讀，合共 21 名新生；[103] 如此，長洲建道聖經學院正式在香港奠基。

隨着時間過去，學院漸漸意識到東南亞有千千萬萬的華僑需要聽聞福音，因此便鼓勵畢業生前往這些華僑羣體中服侍。後來，他們建立的教會基乎遍布東南亞每一個國家，當中更有很多出色優秀的年輕人等待接受裝備；[104] 而學院則努力配合這些教會的需要。當年，建道在香港設校是相當有利的，殖民地政府較諸台灣及東南亞政府中立，方便這些華僑學子前來接受培訓。[105] 及至 1959 年，建道已成為香港收生最多的神學院；學生除來自香港本土外，有很多都是從海外前來求學的華僑。他們畢業後轉到不同地方服侍，其足跡遍布東南亞及歐、美等地。這些校友及其牧養的教會往往支持母校發展，使建道有足夠學生和資源可繼往開來，直至今時今日。[106]

---

[102] 劉福羣：《十架與冠冕》，頁132、136。

[103] W. C. Newbern, "Report to Conference: South China, 1951" (1952); 劉福羣：《十架與冠冕》，頁 137。

[104] W. C. Newbern, "Report to Conference: South China, 1951" (1952).

[105] 劉福羣：《十架與冠冕》，頁 138。

[106] W. C. Newbern, "The China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Sixtieth Anniversary," *The Alliance Witness* 94, no.22 (4 Nov.,1959):12.

七 在香港、台灣及海外宣教植堂

自1951年夏季起，全中國委員會的工作有了嶄新和突破性發展。此刻，長洲建道聖經學院首屆學生快將畢業，西教士積極為這二十名學生尋找出路，最後為他們開闢了香港本土和東南亞宣教的工場。另一邊廂，宣道聖經學院也提供大量佈道人員；學生自發組團向外宣講福音，其足跡遍及北角、筲箕灣、茶果嶺、鯉魚門、荃灣等說國語的新移民社區，幾所堂會亦因此建立起來。另外，隨着大量調景嶺會友遷居台灣，宣道會亦在當地開展工作。以下將分述各項事情：

（一）建立「宣道會華人信徒團契」

1951 年，全中國委員會推動華人信徒建立溝通平台，並成立「宣道會華人信徒團契」（Chinese Christian Alliance Fellowship）。初期，團契成員是大陸來港的會友及梧州建道聖經學院的校友，也包括在長洲建道二十名學生。筆者相信，成員亦有不少塘宣的信徒領袖。委員會建立信徒團契之主要目的，是希望集合所有華人信徒力量以支持長洲建道聖經學院首屆學生，協助他們在畢業後前赴印尼和越南開展宣教工作。[107] 事情是這樣的，那二十名學生原打算畢業後返回內地；但因中國政治變化，重返大陸已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香港並沒有太多牧職空缺，因此他們變得前路茫茫。[108] 正當惆悵之際，學院收到由越南韋郁良牧師及印尼林證耶牧師的邀請，希望這些畢業生前往當地協助華僑的工作；長洲建道頓時刮起前赴東南亞宣教之風。如此，班內有七人願意前往越南和高棉，又有 6 人願意前往印尼、菲律賓和馬來西亞工作。[109] 當時，宣道會只有一所調景嶺堂，若單憑該堂會友和幾名西教士支持，相信畢業生是沒有資源前赴工場工作。

---

[107] "All China Committee Chairman's Report to the Foreign Department, 1951."

[108] Rev. W. C. Newbern, "Victory in the Chinese Bible School," *The Alliance Weekly* 86, no.49 (12 Dec.,1951):778-79; 劉福羣：《十架與冠冕》，頁 140。

[109] Rev. W. C. Newbern, "The Chinese of Southeast Asia," *The Alliance Weekly* 87, no.38 (17 Sept.,1952):608.

翌年，在該信徒團契的協助下，已有 8 位畢業生抵達中南半島宣教，因此全中國委員會更進一步邀請在東南亞的宣道會華人信徒加入該團契組織，使更多人關注海外華僑福音工作，以凝聚更多力量。[110] 自這時起，有大量建道畢業生加入海外華人宣教的行列，他們在不同地方建立華人教會。當年，該團契的成立確是華人信徒邁向海外差傳的第一步。[111]

（二）「香港拓展計劃」

「香港拓展計劃」（Hong Kong Extension Program）[112] 是全中國委員會在 1951 年 3 月開展的事工，目的是在香港尋找合適地方建立堂會或佈道所、將福音傳給「未得之民」。計劃開始是成立一個五人委員會，由貝光道牧師（顧問）及四名長洲建道準畢業生組成。[113]

同年 6 月，他們向全中國委員會提交報告，建議可在下列地點開荒：1. 黃大仙近啟德機場的地方；2. 跑馬地山邊一帶。其主要考慮是兩地都是人口稠密的木屋區，有大量新移民居住，且未有基督宗派進駐；跑馬地更是有學校願意借出禮堂供他們舉行周日崇拜。他們的建議獲全中國委員會接納。[114] 當時，正值長洲建道聖經學院首屆學生畢業的時刻。[115] 他們不能返回內地、滯留香港；而劉福羣院長則急需返回美國，不能照顧他們，於是便拜託塘宣的梅澤生先生將學生寄養在他的家裏，直至他們前赴宣教工場為止。[116] 就在這段時期，全中國委員會除安排他們到調景嶺堂實習外，亦差遣他們前往黃大仙、跑馬地開荒佈道、建立堂會。

---

[110] "All China Committee Chairman's Report to the Foreign Department, 1952;" Rev. Robert Patterson, "All China Chairman's Report, 1952."

[111] Rev. Philip Teng, "Report on the Missionary Program of the Alliance Church Union of Hong Kong, 1966."

[112] 中文名稱由筆者翻譯。

[113] "Minutes of the All China Committee, 8 May, 1951."

[114] "Minutes of the All China Committee, 20 June, 1951."

[115] 在 1951 年 6 月 30 日舉行，是建道第 43 屆、也是香港首屆的畢業禮。

[116] 朱秀蓮、邢福增編：《我們的薦書——建道神學院梧州期校友見證集》（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頁 133。

甲 「黃大仙福音堂」的建立

「黃大仙福音堂」(Wong Tai Sin Chapel)[117] 的工作是在 1951 年 7 月展開。[118] 當時，全中國委員會首先在黃大仙租賃一間兩層木屋作聚會之用，位置是「竹園聯合村」正街。[119] 起初，曾錫亨、梁得人、簡國慶等建道畢業生到這裏街頭佈道、舉辦暑期兒童聖經班，[120] 吸引了一批村民前來聽福音。這些村民大多是從大陸來港的新移民，以外省人居多。至 1951 年尾，福音堂已設有崇拜及主日學聚會，並且有十數位初信者等候領洗。[121] 後來，福音堂購置一石屋作為基址，並取名「竹園聚會所」(後稱：「竹園堂」、「宣信堂」)，聘請曾錫亨先生為傳道主任。[122] 該堂一直延續至今。

乙 「跑馬地福音堂」的建立

「跑馬地福音堂」(西差會稱：Blue Pool Road Chapel 或 Happy Valley Chapel)[123] 的建立，是源於一位基督徒校長願意借出學校禮堂給予宣道會作崇拜及主日學之用。該學校名為「嶺風中學」(Ling Fong Middle School)，位置在跑馬地冬青道與藍塘道交界，[124] 因此西差會將堂會命名為 Blue Pool Road Chapel。跑馬地福音堂與黃大仙福音堂是在同一時期開辦。首先，建道畢業生在區內佈道；數星期

---

[117] 中文名稱見王澤生牧師記事本（該記事本由王明理先生提供）。

[118] *The Alliance Weekly* 86, no.45 (14 Nov.,1951):714; 開辦時間見該檔案圖片附注。

[119] John Bechtel, "Hong Kong Regional Report, 1951;" 〈宣信堂概況〉，《宣青通訊》第 53 期（香港：宣道會區聯會青少年部，日期不詳），頁 6。

[120] 朱秀蓮、邢福增編：《我們的薦書》，頁 133、157； Bartel, "Good News from Hong Kong," 713; Rev. John Bechtel, "Reaching the children in Hong Kong," *The Alliance Weekly* 86, no.45 (14 Nov.,1951):714.

[121] 〈宣信堂概況〉，頁 6；John Bechtel, "Hong Kong Regional Report, 1951."

[122] 周世翹：〈奮力行——點滴宣信堂〉，《宣道會宣信堂 20 週年堂慶特刊（1979-1999）》（香港：宣道會宣信堂，1999），頁 10。

[123] 中文名稱見王澤生牧師記事本（該記事本由王明理先生提供）。請注意，早前筆者的著作將該堂會由英文翻譯為：「藍塘道福音堂」；現作出更正。

[124] 《1955香港年鑑》第八回（香港：華僑日報），頁173。

後才在學校禮堂舉行崇拜及兒童聖經班，吸引了三十位孩童前來學道。[125]

有趣的是，嶺風中學是一所貴族子第學校；然而簡國慶、梁得人等卻將一班街童及孤兒領來聚會。這做法令校方感到非常尷尬，且帶來諸多不便，導致福音工作難以展開。簡、梁等人因此遭到挫折失敗。經此一役，他們領悟到教會與社區和會眾配合的重要性。該堂在 1953 年初結束。[126]

丙　採石工人的聚會所

梁得人、簡國慶兩人在嶺風中學碰壁後，便轉到鄰近渣甸山的木屋區佈道。[127] 上世紀五十年代，渣甸山是一個建築工地，有許多工人開採石頭。工人都是住在臨時搭建的木屋。為了進一步接觸他們，簡、梁兩人也在山上搭建木屋居住。工人中，有二十名原籍廣東省、講客家話的國民黨軍人；他們聽了簡、梁兩人佈道後，對福音大感興趣，願意接受栽培，並主動搭建一間石屋作教堂。小教堂在 1952 年農曆新年建成並舉行獻堂典禮。[128] 這小教堂一直聚會至建築工程完結為止。

（三）「宣道聖經學院」的佈道成果

而另一邊廂，在踏入 1952 年夏季的時候，宣道聖經學院教務主任高玉銘牧師要求學生組織佈道團，在暑假期間自行組隊到營外佈道，藉以提昇學生往外宣教的心志。如此，這些學生組成不同小隊走到鄰近地區佈道。[129] 其中最見成效的，是他們乘船前往對岸香港島的佈道工作。

---

[125] John Bechtel, "Hong Kong Regional Report, 1951;" Bartel, "Good News from Hong Kong," 713.

[126] "Minutes of the All China Committee, 26 March, 1953."

[127] 朱秀蓮、邢福增編：《我們的薦書》，頁 134。

[128] Rev. John Bechtel, "The Stonecutters Chapel," *The Alliance Weekly* 87, no.16 (16 April,1952):250; 潘素行：〈從悟州到拉丁美洲：北宣第一位堂主任——梁得人牧師〉，《家訊》第 167 期（香港：宣道會北角堂，2000 年 12 月）。

[129] 都乾初：〈宣道聖經學院學生聖工紀實〉，頁 83。

甲「北角堂」的成立

1952 年暑假，有 4 男 1 女學生組成佈道隊，計劃在北角海濱展開為期 2 個月的佈道工作。當年，北角有一個大型綜合娛樂場所，名為「月園遊樂場」，吸引大量遊人前往消閒玩樂。初時，一行五人只是在街上派發單張。後來，他們遇到一些熱心信徒，願意開放居所給他們作據點及留宿之用。有了如此支援，佈道隊可全情投入工作。早上，他們進入人多擠迫的市集派發單張。午飯後，他們逐家叩門，尋找機會向人介紹福音。夜間，佈道隊在月園遊樂場附近舉辦露天佈道晚會。後來，全中國委員會主席白德三牧師亦前來助陣，協助晚會工作。[130]

兩個月後，佈道隊成員返回學院上課，白牧師則帶領一羣初信者，在當地成立「宣道會北角堂」。後來，佈道隊女成員汪彬決定留下建立教會；全中國委員會則派遣梁得人、傅忠愛及李欣頌三位建道畢業生前來襄助；另差派原華西教區林路德教士（Miss Ruth E. Lindstrom）[131] 督導工作。[132] 日後，北角堂有良好發展，至今是香港最具規模的堂會之一。

乙「筲箕灣堂」的成立

1953 年春，有學生佈道隊前赴筲箕灣展開佈道。[133] 筲箕灣位處香港島東北面，當時有數以萬計的難民搭建木屋居住，形成十三個寮屋村落。當年佈道隊的工作沒有留下紀錄，只知道隊員在回校前已建立了一羣初信者。後來，這羣體得到全中國委員會的幫助，於同年 4 月成立「宣

---

[130] Rev. John Bechtel, "Hong Kong's "Coney Island" Hears the Gospel," *The Alliance Weekly*, 88:18 (6 May,1953):10; 胡欽：〈本堂歷史述要〉，《宣道會北角堂銀禧記念特刊》（香港：宣道會北角堂，1977），頁2；都乾初：〈宣道聖經學院學生聖工紀實〉，頁83。

[131] 林路德教士在 1920 年起在中國宣教，能說流利國語，她在北角堂工作至 1955 年 9 月退休。

[132] 胡欽：〈本堂歷史述要〉，頁 2；朱秀蓮、邢福增編：《我們的薦書》，頁 157。

[133] 《善牧恩慈——崔冠軍牧師榮休十週年感恩集》（香港：宣道會宣恩堂、證恩堂聯合出版，1996 年 8 月），頁 10。

道會筲箕灣堂」。[134] 梁得人、李欣頌、潘瓊芳三名建道畢業生前來協助，林路德教士作督導。[135] 筲箕灣堂一直延續至今。

（四） 宣道會在台灣發展

早在 1951 年，已有調景嶺堂會友遷居台灣；他們是剛剛領洗、信仰尚未鞏固的信徒。在台北，他們聚首一起查考聖經、彼此扶持。[136] 1951 年 6 月，全中國委員會原打算差遣高玉銘牧師到台灣牧養這些會友，並計劃在當地建立教會。[137] 後來，高牧師沒有成行；相信是調景嶺環境特殊，難以物色接任人選。[138]

直至 1953 年，赴台的調景嶺會友愈來愈多，而當地亦聚居了一些由上海來的宣道會會友；他們多次致函促請全中國委員會到台協助建立教會。1953 年 4 月，委員會主席白德三牧師親自前來拜訪他們，並在長安西路租借了一個可容納 150 人的單位建立教會，「宣道會長安西路佈道所」[139] 正式成立；奠下宣道會在台灣發展的基礎。[140]

初期，佈道所沒有全職牧者；直至 1953 年尾，曾在調景嶺服侍的歐粹珍教士放棄在美國的退休生活，回到他們當中。至於香港方面，全中國委員會差派曾接受神學訓練的調景嶺會友前來協助：王新成、林秀庭、凌克非等人先後加入他們的行列。[141] 如此，宣道會在台灣漸漸成長。

---

[134] "Minutes of the All China Committee, 12 March,1953."

[135] "Minutes of the All China Committee, 26 March,1953."

[136] Bartel, "Good News from Hong Kong," 713.

[137] "Minutes of the All China Committee, 20 June, 1951."

[138] 都乾初：《宣道聖經學院學生聖工紀實》，頁 83。

[139] 「宣道會台北堂」的前身。

[140] "5 Lung, Lane 78, Chang An West Street…," *The Alliance Witness* 88, no.29 (22 July, 1953):16.

[141] Rev. Charles E. Notson, "Taiwan: A New Challenge," *The Alliance Witness* 100, no.18 (1 Sept., 1965):12-13.

八 宣道會奠基香港：設立「中國—香港教區」

經過三年的努力，香港無疑已成為宣道會在華出版、佈道及培訓傳道工人的大本營。在 1953 年初，該會在當地建立了宣道書局、建道聖經學院及宣道聖經學院；同時擁有六間堂會 / 佈道所，會友數目累計約有 1,500 人。[142] 當時，香港局勢已有緩和現象，社會人心亦漸趨穩定。因此之故，在 1953 年 4 月，美國總會代表傑弗遜牧師（Rev. D. I. Jeffrey）[143] 來臨香港，在西教士會議上建議成立宣道會「中國－香港教區」（China － Hong Kong Field）；此舉乃標誌總會認同並確立全中國委員會的工作。[144] 如此，宣道會正式奠基香港；其服侍對象除中國大陸、香港及台灣的人民以外，亦包括散居在東南亞及世界各地的華人社羣。

九 結論

本文詳細闡述了香港宣道會的奠基過程。總括來說，由 1949 年西教士南下香港，至該會在當地正式設立宣教區止，其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初期，全中國委員會的工作主要是支援內地教會和信徒。西教士冀望在中國邊陲的殖民地上，與內地教會保持聯繫；並透過書信及《聖經報》等刊物，幫助內地信徒成長；這是第一個階段。及至韓戰爆發，大陸對外政策逐漸收緊，致使西教士與內地教會的聯繫中斷。這個時期，全中國委員會將焦點轉移至香港本土的發展上；除在當地延續了宣道書局及建道聖經學院外，亦積極投入服侍大陸來港的難民。他們在難民營開荒佈道、建立教會，並開辦聖經學院以培育信徒。第三階段開始於 1951 年夏天，當時正值二十位梧州來港學生畢業的時候，後來再加入宣道聖經

---

[142] 單是調景嶺已有1,300多人受洗加入宣道會。

[143] 中文名字是筆者的翻譯。

[144] "Minutes of Hong Kong-Kowloon Area Conference, 30 April, 1953." 早年，「中國—香港教區」範圍包括大陸、香港及台灣。後來，台灣宣道會漸漸成長，並在 1960 年 8 月脫離「中國－香港教區」而建立「中國－台灣教區」。

學院的學生佈道團；兩所學院訓練出一批又一批傳道和佈道人員。在香港，他們前往新移民地區四出佈道、建立教會；在東南亞，他們走進華人社區服侍、宣講福音。另外，在同一時期，有大量調景嶺會友遷居台灣；他們抵台後仍在一起聚會敬拜、在當地建立教會；如此，宣道會開展在台灣的服侍。

香港宣道會是在偶然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的；然而，其建立的過程卻絕非偶然。首先，是因為有一羣對華宣教經驗豐富的西教士，他們本於對中國教會和信徒的關愛之情，堅持留在香港。後來，這些西教士在殖民地上開展福音事工；他們尋找合適的工作夥伴，如：學聯會、遠東廣播、九龍塘中華宣道會及兒童基督教福利會等；透過與當地華人信徒的協作，致使各項事工能夠順利推行。另外，就是這些西教士對培育華人信徒和工人的決心；他們在風雨飄搖的政局和資源緊缺的情況下，毅然開辦長洲建道聖經學院及宣道聖經學院，可謂極具信心及遠見。日後，兩所學院的學生皆是對佈道及宣教充滿熱誠，在畢業後四出佈道並成為華人教會的新力軍。更重要的，是這些西教士及華人傳道能夠秉承宣道會精神；[145] 他們建立華人信徒團契以凝聚各方力量，然後差派工人前往普世開荒佈道、建立教會。如此，基督福音能夠在香港難民及新移民地區廣傳，也在海外各地華人社羣中傳播。

1953 年，宣道會「中國－香港教區」正式成立，使該會六十多年在華宣教的歷史不致終結。不但如此，其福音抱負及使命更是從中國大陸伸展至香港、台灣、東南亞及世界各地的所有華人。截至 2018 年，宣道會分別在香港及台灣擁有 117 間及 32 間堂會，[146] 在東南亞及海外各地亦建立了多間華人教會。有如此發展，相信是昔日該會料想不到的。

---

[145] 宣道會精神可見其英文名稱：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其宗旨是聯合各方信徒力量，差遣宣教士前往普世宣講福音。

[146] 堂會數目參考：《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 2018 年報》（香港：該會，2019）；〈基督教宣道會台灣省聯會：台灣各堂會〉；<twcama.fhl.net/church/churchhistory.html>（2019 年 5 月 15 日下載）。

撮　要

本文記述和分析香港宣道會的奠基過程。事情由1949年開始，當時中國內戰已進入最後階段。因應局勢發展，宣道會決定關閉所有中國工場，並指令西教士撤離中國。然而，有十數名西教士不願離去；他們選擇逗留香港，與大陸教會保持聯繫，透過書信及《聖經報》幫助內地信徒成長。及至韓戰爆發，這些西教士將工作焦點由內地轉到香港的發展上；他們在當地延續了宣道書局及建道聖經學院外，也投入難民和新移民的服侍。宣道會在難民營和新移民聚居地開荒佈道、建立教會、開辦聖經學院等。後來，他們的服侍更伸展至台灣、東南亞及世界各地的所有華人。經過三年的努力，香港已成為宣道會在華出版、佈道及培訓傳道工人的大本營。在1953年，宣道會「中國－香港教區」正式成立，致使該會六十多年在華宣教的歷史得以延續，並且展開嶄新一頁。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describe and analyze how the foundation of The Hong Kong 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 ("HKC&MA") was laid. It all began in 1949 when the China Civil War came to an end. As it developed, The 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 ("C&MA") decided to close all its operations in the Chinese fields and instructed the missionaries to depart China. However, there were approximately 14 missionaries who were unwilling to leave. They chose to remain in Hong Kong and stayed connected with the churches in China. They helped the Christians in Mainland China grow by writing letters and the publication of *Bible Magazine*. As the Korean War commenced, these missionaries started to change their focus from Mainland China to Hong Kong. They continued the work of The Alliance Press and The Alliance Bible Institute, as well as the work on refugees and new immigrants. Evangelism was started at refugee camp and new immigrants. Churches and Bible colleges were commenced. Their ministry was even extended to Taiwan, South East Asia and Chinese around the globe at a later stage. After 3 years of untiring effort, Hong Kong became C&MA's headquarter at the Chinese Community for publication, evangelism and training ministers. In 1953, C&MA's "China-Hong Kong Field" was established. This brought a continuation of the 60 years of history in Mainland China as well as unfolded a new chapter in C&MA's history of Chinese ministry.